



外国戏剧研究资料丛书

阿瑟·密勒论戏剧

[美] 阿瑟·密勒 著
郭继德 等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外国戏剧研究资料丛书

阿瑟·密勒论戏剧

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
外国戏剧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

〔美〕阿瑟·密勒 著
郭继德等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外国戏剧研究资料丛书

阿瑟·密勒论戏剧

〔美〕阿瑟·密勒著

郭继德等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5,000 插页 8

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0109-8/J·33

定价 3.80 元



作者像

12/31/85

Dear Guo Ji-de;

Here is a short preface which I have just written especially for your edition. I hope it is suitable.

Happy New Year!

And best regards from my wife, Inge.

信 件 译 文

亲爱的郭继德：

这是我专为你们出版此书所写的一篇简短前言，望能合用。
祝新年快乐！

阿瑟·密勒(签字)

1985.12.31

阿瑟·密勒的戏剧理论与创作

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 1915—)是美国当代举足轻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也是当代西方戏剧界名闻遐迩的悲剧作家。他出生在一个犹太裔美国家庭里,年轻时期亲眼目睹了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所造成的凄惨状况,这对他的思想和后来的戏剧创作有较大影响。他在密执安大学读书期间就酷爱戏剧,写的剧本《没有恶棍》(1936)和《黎明的荣誉》(1937)均获霍普伍德戏剧奖。一九四四年上演的《鸿运高照的人》使他第一次涉足百老汇。不久,《全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 1947)上演成功,为他赢得纽约剧评界奖,密勒开始在美国戏剧界崭露头角。一九四九年上演成功的《推销员之死》是美国戏剧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剧本之一,长年连演不衰,在西方戏剧界引起轰动,接连获剧评界奖、普利策戏剧奖、美国报界奖、戏剧俱乐部等六项戏剧奖,奠定了他在美国戏剧界的地位。后来又先后上演和发表了《炼狱》(1953)、《回忆两个星期一》(1955)、《桥头眺望》(1955)、《堕落之后》(1964)、《维希事件》(1964)、《代价》(1968)、《用演奏来延宕时间》(1979)和《美国时钟》(1980)等剧本以及长篇小说《焦点》(1945)和短篇小说集《我不再需要你》(1967)等作品,使他的声望与日俱增。

密勒不仅是一位卓尔不群的剧作家,而且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戏剧理论家。从四十年代末起,他的戏剧论文一篇接一篇问世,到一九七七年密执安大学英文系教授罗伯特·马丁(Robert A.

Martin)将他的优秀论文编辑成《阿瑟·密勒戏剧论文集》(The Theatre Essays of Arthur Miller)时,密勒本人吃了一惊,没有想到自己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竟写了这么多篇戏剧论文,并谦逊地说自己不是一位“学者”,不是一位“评论家”,但他的论文涉及面之广,对问题分析之透辟以及学术造诣之深,恐怕是许多自称为“学者”或“评论家”的人所望尘莫及的。

阿瑟·密勒的戏剧观,特别是他的悲剧观点跟传统的悲剧观念有一些不同之处。他大声疾呼,悲剧要写普通人,要让小人物,即下层阶级人物登上悲剧历史舞台。

在传统悲剧中,把社会地位和门第出身看得高于一切,也就是说,只有国王、王后、皇亲贵戚以及其他有高贵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做悲剧的主人公。从古希腊悲剧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情形大抵如此。在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中虽然也有小人物,但均是作为陪衬人物出场的,如宫廷小丑或傻瓜等。在十八世纪,西方出现了以中产阶级人物为主角的家庭悲剧,英国剧作家乔治·里洛(George Lillo, 1693—1739)的《伦敦商人》(1731)是这类剧中一个较早的例子。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登上西方戏剧舞台,出现了写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悲剧。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以主人公的姿态登上悲剧舞台是在十九世纪跟二十世纪之交。如高尔基(1868—1936)的剧本《底层》(1902)成功地塑造了乞丐、流浪汉、妓女等一组栩栩如生的下层阶级人物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约瑟夫·伍德·克鲁奇为代表的一批

美国戏剧评论家断言，现代剧中没有真正的悲剧，因为在现代这个没有国王的时代里匮乏悲剧人物，在美国的“太平盛世”里没有造成悲剧的因素。还有位美国戏剧评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29—)写了《悲剧的死亡》(1961, 1980)一书，论述现代悲剧的殒灭。然而，密勒从不人云亦云。早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即在《推销员之死》首演的同一个月里，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悲剧与普通人》一文，明确地指出：“我相信，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普通人跟国王同样都是悲剧描写的天然对象。”同时，密勒还向作家发出呼吁，“在我们这个没有国王的时代，是我们看清历史的光明面，追根溯源，努力探索普通人的心灵的时候了。”密勒并非反对古典悲剧写皇亲贵戚人物，而是驳斥那种认为在没有国王的时代里便没有悲剧的荒谬见解，旨在提醒作家要写普通人，让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以主人公的姿态登上现代戏剧舞台。他在为自己的《戏剧集》(1957)写的引言中说道：“亚里士多德谈过(主人公)从高位上跌落下来这个问题，不消说，一个普通人是适合于做一个悲剧主人公了。如今距离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已有许多个世纪。……事物确实在变化着，甚至一位天才也不免受到他的时代和他处的社会的性质的局限。”在古希腊，奴隶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戏剧，特别是悲剧中所讴歌的主人公也一定得从取悦于统治阶级的角度出发，这是历史的必然。但现在，我们看问题必须从现实出发，必须有发展的眼光，不能因循旧习，抱残守缺。密勒说过，他自己宁愿去找美国医学院刚毕业的最差的学生看病，也决不会去求助于古希腊的被称之为医学之父的天才医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身份只能是判定人在阶级社会中等级地位的标志，而不是决定人生价值或决定人物形象高大或藐小的标志。在舞台上，一个普通人的举动不引人注目，一旦发现他是美国总统，

他的身价便会蓦地提高百倍，他做的最微不足道的事也要比他是一另杂货店店主时做的同样的事显得重要多了。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一种很流行的时髦看法。然而悲剧人物形象并非绝对取决于人物身份的高贵或低贱，那个小店主只要从事对人类的生存有价值的事业，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超过总统的高大悲剧人物形象，而总统要是做出了危害人类正义事业的行为，也便会为人类所不齿。因而，密勒得出结论，绝对不能把普通人排斥在悲剧之外。

密勒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实践了自己的理论，绘声绘色地塑造了推销员、店员、农夫、码头工人、警察等一批下层阶级的悲剧人物形象。例如，《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之所以能久演不衰，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剧有深刻的思想内容，真实地揭示了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影响下的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悲惨命运。主人公威利·洛曼是一位推销员，三十年如一日，栉风沐雨，疲于奔命，为老板兜售货物，痴望能实现自己的成功美梦，但到年老力衰时，嗜血成性的老板“吃了橘子，把皮给扔掉了”，即一脚把他给踢开了，他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美国梦成了泡影，但他仍然望子成龙，决心用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两万美元保险金来为儿子买个“锦绣前程”。殊不知，资产阶级的成功哲学是“吃人”，是靠剥削发迹。威利至死认识不到问题的实质，反误以为自己的死会换来美国梦的实现，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该剧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在纽约市摩洛哥科剧院首演成功，当帷幕徐徐落下时，许多观众的眼眶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一些饱经风霜的老推销员更是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剧本揭示的普通人的悲惨命运触动了观众的心弦，他们从威利·洛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者由此联想到自己的亲戚朋友也遭受过同样不幸的命运或有类似的令人心酸的结局。一九八〇年《美国时钟》(The American Clock)在

纽约市演出“失败”后，戏剧评论家罗伯特·摩斯(Robert Moss)曾撰文指出，越是“上层人”，对密勒的评价越低。因为他的剧本写的是“下层人”，反映了“下层人”的愿望，不断地触疼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伤疤，因而不可避免地激怒了上层人。

二

阿瑟·密勒认为悲剧要着重写人物跟周围环境的关系，跟社会现实的关系，正如他一九八一年夏天对我本人所说的：“戏剧应该表达整个社会的愿望，应当对人类的生活具有崇高至上的意义。”

在古希腊悲剧中，也写人与外界环境的搏斗，但主要是写人跟先天注定的命运搏斗，主人公往往受到命运的捉弄和摆布，只能以失败告终，落个悲惨结局。欧洲中世纪戏剧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多写圣经主题。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极力想从神的枷锁中挣脱出来，把人看作是宇宙的中心，因而戏剧多写人与神的冲突，主人公由于自我发现或由于自我认识而导致采取果敢行动。但无论是在古希腊悲剧中，还是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等待主人公的却是灭顶之灾，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悲剧瑕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主人公不应当是“一位十全十美的人，他的不幸正是由于自己的某种过失或弱点造成的”。换句话说，个人的“缺点”是导致主人公悲剧的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原因，但这种观点忽视了酿成人物厄运的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到十九世纪末，随着社会问题剧的崛起，一批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开始通过戏剧探讨社会问题，即探讨社会对戏剧人物命运的影响，易卜生是这类剧作家的先驱。

阿瑟·密勒一贯尊崇社会问题剧作家，他从易卜生的作品中，

从美国三十年代进步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 1906—1963)等人的作品中汲取了营养。一九五一年,他在为改编易卜生的《人民公敌》撰写的前言中指出:“必须再次让公众明白,舞台正是进行思想探讨、哲学探讨和最热烈地讨论人类命运的场所。亨里克·易卜生就是进行这种探讨的大师之一,而我不揣冒昧,要再次指出这一点。”密勒在这里鲜明地指出了戏剧应当描写的对象和戏剧在探讨人生真谛过程中应起的作用。他一再强调戏剧的社会作用,强调戏剧要写人与现实社会环境的关系,认为剧作家应当认识到,“社会是人组成的,人寓于社会之中;如果你不理解人的社会关系和后者对人的成长的影响,就根本不能创造出逼真的舞台形象来。”密勒还说过,悲剧应当对整个世界进行全面检验,人们会在检验过程中得到益处,会找到产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因为在密勒看来,正如他在《论社会剧》一文中所指出的,历史已经赋予社会剧新的生命,假使我们不能说戏剧是完全由社会铸造成的,但可以说几乎没有一方面是不受社会影响的。

密勒不否认个人因素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而只是更强调社会因素对悲剧人物命运的影响,主张通过解剖社会,挖出造成悲剧的祸根——邪恶势力。在《炼狱》(The Crucible)中,密勒大胆地向邪恶势力发起了挑战。该剧是以一六九二年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发生的一桩审讯“行巫者”的案子这一真实历史事实为基本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写成的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剧中的副州长兼法官丹福思暴戾恣睢,杀人不眨眼,经他批准,四百多人横遭逮捕,身陷囹圄,七十二人被杀害,酿成一场大悲剧。他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他的邪恶本性被揭露得淋漓尽致,但在作者看来,丹福思自己不应该在剧中减轻他实际上犯下的罪行。因为密勒认为,着重揭露他的罪恶和残忍正是揭露他所代表的神权政治

机构和一切统治阶级的累累罪行。剧本通过写对“行巫者”的迫害把矛头指向了五十年代初期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908—1957)为代表的美国反动势力,谴责他们对进步人士、对共产党人的残酷政治迫害。在密勒的笔下,“恐怖气氛浸透着《炼狱》的字字句句”,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在白色恐怖气氛之中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给当权者迎头一棒。但密勒的意图还不止于此,他反对的是一切政治迫害,谴责的是一切邪恶势力,即从广义的角度说是写善与恶斗争的,以使剧本有永恒的价值。他的独幕剧《回忆两个星期一》(A Memory of Two Mondays)勾勒出了三十年代美国小职员生活的一幅真实画面,他们没有远大理想,没有欢乐,人间世态为什么如此炎凉?为什么到处是悲怆气氛?作者没有直说,但通过对室内光线暗淡、耗子到处跑等情景的真实描写,暗示出是社会的黑暗和剥削制度的存在造成的,一些吸血鬼们象耗子一样吮吸着人们的鲜血和骨髓。《美国时钟》写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如何毁灭了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电视剧本《用演奏来延宕时间》(Playing for Time)以波兰的奥斯维辛德国纳粹杀人集中营为背景,以歌星法妮亚·芬伦(该集中营的幸存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无情地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滔天罪行,作者毫不含糊地指出,是灭绝人性的反动势力一手制造了这场对犹太人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悲剧。密勒的这些剧本都从不同的角度针砭了时弊,剖开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着的一颗颗毒瘤,但又无不受到了社会因素的影响。

三

阿瑟·密勒认为,悲剧应当为人类提出美好的理想,必须有

鼓舞人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的主要目的是激起怜悯和恐惧，对主人公的怜悯以及对上帝的力量和神秘力量的恐惧，造成观众的思想感情上的升华或净化。多少个世纪以来，对“升华”（或“净化”）的涵义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二十世纪西方的一些悲剧多是描写人类命运多舛以及他们的失败和绝望情绪，格调较低，缺乏激励人的力量。密勒认为，这些悲剧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在《悲剧的性质》一文中指出：“悲剧最准确地、维妙维肖地描写人为争取幸福而进行的斗争。”这也就是说，写悲剧一定要有理想和抱负。人们绝对不可在悲剧情感和怜悯之间划等号。密勒在《论社会剧》中提醒人们，千万不可陷入“怜悯的沼泽之中”，因为“那里的水是旧时的眼泪，而不是造就新生活的生育之海”。一位先生在大街上漫步时，被从楼上掉下来的一架钢琴砸死，各家报纸会把此事件列为头条新闻，说这是一场悲剧，但实际上仅仅是人们对死者的怜悯而已。悲剧不仅能激起人们的悲伤、同情、同感，甚至恐惧，而且能给予人们知识，使人们受到启迪，看到更加光明的前景，使悲伤超脱怜悯，升华为悲剧气氛。因而在悲剧中必须有欢乐，必须有美好生活的许诺，必须比喜剧更能表达作者的乐观情绪，使主人公获得“悲剧性胜利”。

简言之，密勒认为，写悲剧的目的不是引导人们陷入痛苦和失望的深渊，而是要鼓励人们为了实现美好的生活理想而斗争。在《推销员之死》中，主人公威利·洛曼自始至终是怀有成功梦想的（尽管是不切实际的），他之所以欣然自戕，也是试图用自己的生命为长子比夫开辟一条成功之路，让儿子一代人实现他奋斗终生所没有能实现的梦想，可以说他从心理上获得了悲剧性胜利。

《炼狱》中的主人公普洛克托精明强干，主持正义，当他为了伸张正义和揭穿骗局大闹法庭而陷入困境的时候，也决不做有损自己的尊严和名声的事，决不干出卖他人的事，断然拒绝在坦白书上签字，在胥骂副州长丹福思一顿之后，便迎着朝霞，昂首阔步，走向刑场。他的肉体被消灭了，但他的名声保存了下来，他的正义感战胜了邪恶，即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精神上或道义上的胜利，换句话说，他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走上绞架的。该剧给人的是激励，是信心，是希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一些大员们在看完该剧演出之后，也情不自禁地为普洛克托这个富有戏剧性的英雄人物鼓了掌，可见其艺术形象感人之深。

密勒倡导悲剧要写有理想的人物，他在《炼狱》一剧中也成功地塑造了普洛克托这个坚强不屈的理想人物形象，从而向反动势力投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密勒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也受到了反动势力的仇视、刁难和迫害。一九五四年，他申请去布鲁塞尔出席《炼狱》演出开幕式，美国国务院借口他是“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怕他出国后会发表反美演说，因而拒绝发给他护照。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密勒受到美国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要他坦白交待四十年代末期跟共产党人作家的联系。他也象普洛克托那样，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声誉，坚决不做“告密者”，毅然拒绝回答那些老爷们提出的问题，因而犯下了“藐视国会罪”，被罚款五百美元，判刑三十天。密勒不服，经过多次上诉，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得以昭雪。他在《炼狱》中塑造了一个有尊严的人物形象，他自己做的也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这种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也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目 录

- 阿瑟·密勒的戏剧理论与创作 郭继德 (1)
- 中文版序 阿瑟·密勒 (1)
郭继德 译
- 悲剧与普通人 郭继德 译 (1)
- 悲剧的性质 郭继德 译 (6)
- 易卜生《人民公敌》改编本序言 赵 澧 译 (11)
- 作家多，戏剧少 黄嘉德 译 (17)
- 美国剧院 黄修齐 译 (22)
- 论社会剧 郭继德 译 (43)
- 现代戏剧中的家庭 郭继德 译 (60)
- 一九五六年及其它种种 张禹九 译 (78)
- 《戏剧集》引言 梅绍武 郭继德 译 (102)
- 视若神明的人物之幽灵 欧阳基 译 (162)
- 道德与现代戏剧 蓝仁哲 译 (185)
- 论改编 屠 珍 译 (205)
- 《桥头眺望》序言 刘荫岛 译 (209)
- 论赏识 李 英 译 (214)
- 什么使戏剧持久不衰? 陶 洁 译 (230)
- 从奥尼尔到现在的百老汇剧院 李乃坤 译 (236)

《美国时钟》与三十年代·····	李 醒 译 (243)
—阿瑟·密勒访问记	
戏剧与社会·····	郭继德 译 (256)
—阿瑟·密勒访问记	
美国作家，美国剧院·····	许怀秀 译 郭 文 校 (265)
推销员的回忆·····	李 醒 译 (282)
附 录 阿瑟·密勒生活、创作年表·····	(291)

悲剧与普通人·

在当今这个时代里，悲剧近乎绝迹。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匮乏是因为在我们中间缺少英雄人物，或是因为现代人本能地从信念上就怀疑科学，而对人生的大胆抨击是不能依赖沉默寡言和谨小慎微的态度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人们常常认为我们自己达不到悲剧的高度，或者说悲剧对我们来说是高不可攀的。这样一来，必然的结论是悲剧模式是属于古代的，只适合用在处于高位的国王身上，或皇亲贵戚身上了。

我相信，在悲剧的最高意义上，普通人跟国王一样，都是适于作悲剧描写的对象的。从表面上看，用现代精神病学的观点来衡量，这应当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精神病学分析是以古典公式为基础的，譬如，俄狄浦斯恋母情结和奥列斯特恋父情结，虽然都是发生在皇家显贵身上的事，但也适用于任何一个处于同样激情之中的普通人。

更直率地说，当悲剧问题在艺术中不存在争议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无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都有同样的精神变化过程。说到底，如果说悲剧行动的升华真的只是高贵人物独有的特征，那么广大群众热爱悲剧胜过其他一切形式，那就令人不

-
-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密勒的著名剧作《推销员之死》于纽约上演后，他于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此文。